

哲学何时变为宗教——早期奥古斯丁忏悔的逻辑^{〔1〕}

陈越骅

(浙江大学哲学系,杭州 310028)

摘要:早期奥古斯丁在米兰期间学习了柏拉图主义哲学,这对他皈依基督教起了重要作用。除了在《忏悔录》中的回忆,他最早的一批著作《加西齐亚根对话》也给了我们关于他从什么时候以及如何由哲学领悟转变成宗教信仰的重要线索。实际上,促使他写作《对话》的动机却是神秘的宗教经验、米兰教会的强大影响力、以及他融合基督教教义与哲学的努力。他在《对话》中讨论了对个体存在意义问题的危机——人是否有可能获得真理从而获得幸福生活?哲学提供了问题框架,而基督教则为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答案:神就是真理,智慧就是认识和拥有真理,所以智慧者既是神又是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因此奥古斯丁写作从一开始就是宗教的忏悔,哲学对他来说不过是用于解释领悟了的事实的理性工具。

关键词:奥古斯丁;教父学;加西齐亚根对话

作者:陈越骅,清华大学博士,浙江大学宗教学所主任助理,副教授博导,近年出版著作有:《跨文化视野中的奥古斯丁》、《神秘主义的学理源流——普罗提诺的太一本原论研究》。地址: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人文学院大楼哲学系,电子邮件:chenyuehua@zju.edu.cn

早期奥古斯丁究竟是皈依了柏拉图主义还是基督教是一个奥古斯丁研究中争讼不休的重要问题。^{〔2〕}这个问题的提出与解答都与对早期奥古斯丁著作的深入研究离不开关系,特别是对《忏悔录》之前的“加西齐亚根对话集”的研究更是关键。因为传统上我们基本公认《忏悔录》是奥古斯丁的代表作,而奥古斯丁又是西方教会拉丁教父的集大成者,那么顺理成章的他在写作的《忏悔录》的当然就是代表基督教思想,不管是基督教的神学也好,还是基督教的哲学也好。况且他已经有了教职的外在身份。由此又衍生出另一个关系密切的关联问题需要解答:要么《加西齐亚根对话》集与《忏悔录》表现了精神皈依前与皈依后的奥古斯丁(前者从时间看是在他正式洗礼前写作的),两者作为真理表白的内在逻辑是不同的;要么两者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是代表了思想深度的渐进发展。当然还有很多种别的解读的可能,不过我们大致可以在这个大的范畴来理解这些问题。

奥古斯丁在晚年《订正录》中并没有彻底否定自己早期著作,主要是认为当时用词不当,而且更重

〔1〕 Yuan GAO, "Augustine's Conception of Sexuality and Marriage: A Defense against Alignment of Human Merits on Contin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vol. 12, 73-79. (<https://www.sinowesternstudies.com/back-issues/vol-12-2017/>)

〔2〕 参见周伟驰 Zhou Weichi, "现代奥古斯丁研究"Xiandai Aogusiding yanjiu [Modern Research of Augustine], 载《现代哲学》Xiandai Zhexue [Modern Philosophy], 2005(03), 94-97 页。特别是其中对 1950 年代的法国学者 Pierre Courcelle 研究《忏悔录》的经典著作的介绍,所谓奥古斯丁研究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关于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主义在引起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转向简介可见拙作陈越骅 Chen Yuehua, 《跨文化视野中的奥古斯丁》Kuawenhua shiye zhong de Aogusiding [Augustine in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杭州 Hangzhou: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Daxue chubansh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3-4。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奥古斯丁《加西齐亚根对话》全集翻译”(14CZJ001)资助。

要的是他完整地保存了这些著作,作为最初的公开的表白文档或者说“忏悔”。〔3〕结合他在《忏悔录》对这一时期的回忆,他在加西齐亚根退修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自己对个体存在意义问题的危机——人是否有可能获得真理,如何有可能获得幸福生活?另外就是作为洗礼前的准备,不管是思想上与自己和解还是在关系上与亲人和朋友和解。下面我们主要根据奥古斯丁的早期著作《加西齐亚根对话集》探讨他为什么写作,他对哲学与宗教重叠的共同问题的论证逻辑,以及他得出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以此初步回答这套对话集作为公开的“忏悔”究竟为自己作了何种辩护。

1. 对早期思想历程的表白

奥古斯丁早期信仰摩尼教,他从早年就已经有了宗教体验和宗教组织生活,他的“出场”就不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出现,其思想倾向不如说更多是一个阅读过哲学著作的有学识的宗教家。奥古斯丁自己回忆,在去罗马任教之前,他对哲学家的学说是信任也不能完全理解的。可能他除了西塞罗的著作还没深入阅读柏拉图主义者的哲学著作。

至于那些不识基督名字的哲学家,我也并不信任他们,请他们治疗我灵魂的疾病。……这时我心中已产生了另一种思想,认为当时所称“学园派”哲学家的识见高于这些人,他们主张对一切怀疑,人不可能认识真理。我以为他们的学说就是当时一般人所介绍的,其实我尚未捉摸到他们的真正思想。

……我本来能够用信仰来治疗我的疾病……我灵魂的病,本来只能靠信仰来治疗……(《忏悔录》5.10,6.4)〔4〕

奥古斯丁深入阅读哲学书籍在“米兰圈子”里开始的。在那里,他被推荐阅读柏拉图主义著作,而且他听了翻译者坚定基督教信仰的英勇案例(《忏悔录》8.2)主教安布罗斯和奥古斯丁在米兰结识的其他富有学识的朋友也阅读柏拉图主义的书籍。在这个环境中,柏拉图主义哲学与基督教并不被认为是矛盾的,反而被认为是帮助理解信仰的有效途径。因为“柏拉图派的学说,却用各种方式表达天主和天主的‘道’”。〔5〕哲学服务于宗教是一种共识。因此奥古斯丁思想的柏拉图主义哲学痕迹并非一种个人行为的结果,而是当时知识环境的结果。但是如何运用和理解柏拉图主义思想则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奥古斯丁的杰出成就是他在坚持基督论的前提下发展自己的综合理论。〔6〕安布罗斯的典范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奥古斯丁多次听他的讲道并称赞说,里面充满了灵魂超脱尘世飞往另一个世界的呼吁——这种彼岸性的思想给奥古斯丁带来革命性的影响。〔7〕其中思想转变的关键在于安氏用于阅读圣经的“文字使人死,精神使人生”的原则。〔8〕下面我们还要不断地回到这个原则,努力理解哲学在其中扮演的作用。

386年的“米兰花园奇迹”事件一向被认为是奥古斯丁内心皈依的标志。这甚至已经成为一个文

〔3〕 奥古斯丁,《订正录》I.1.4. Augustine.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a new translation (Vol. 60): the Retractions[M]. Bogan S M I tr. Washington, D. C. :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68, p. 10.

〔4〕 奥古斯丁 Augustine,《忏悔录》Chanhuilu [Confessions]. 周士良 Zhou Shiliang 译, (北京 Beijing: 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 [Commercial Press], 1996)。下面引用《忏悔录》都来自此本,不再注明。

〔5〕 同上,第八卷,第2节。Ibid. Ⅷ, 2.

〔6〕 Brown P. ,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486.

〔7〕 Brown P. , 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75.

〔8〕 《忏悔录》,第六卷,第4节。Augustine, Confession, VI. 4.

化符号,因为而奥古斯丁的转变/改宗(conversion)被认为是西方文学上仅次于保罗的改宗,他在花园受到上帝直接启示一样的“突然改宗”的模式与保罗的案例如出一辙。因为两者的相近,所以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神话/迷思”(Mythos),只是标志而已。因为从宗教的观点看,改宗强调的是心灵的转向,而不是强调信条的转变,奥古斯丁长期以来经历了“基督教、摩尼教、西塞罗怀疑主义、物质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的漫长转变过程。每一次改变都不是干脆利落,而是相互纠缠渗透。^[9]

如果我们把“花园奇迹”看作是一种宗教体验,那么体验可以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对奥古斯丁的思想变化是有突出意义的。花园奇迹之前,奥古斯丁长长铺排的是影响自己心意改变的各种外在与内在的“讲理”,但唯有花园奇迹是“神迹”——奥古斯丁认为是神与自己的直接启示。或者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所谓哲学也好、神学也好,各种人间的智慧并不能使他真正有精神转向,他在等待的其实是“来自神的”直接的灵感与朕兆。(《忏悔录》8.12)花园奇迹之后,他启程前往加西齐亚根疗养和写作,从时间上看,当时的著作应该就是信仰确立后的辩白,所谓“我的文学已经为你服务”。(《忏悔录》9.4)神迹是他信仰生发与巩固不可或缺的支撑,也是他区分哲学与其它宗教的标准之一,例如他在疗养期间牙疼了,据说亲友们祷告后他就痊愈了。(同上)这种经历作为“事实”是他信仰论证的坚定支柱。

仅从他自己承认的早期经历而言,他从来就是“宗教的”,在身份认同上、在生活实践上、在思维方式上等等。因为我们要分清楚今天我们所认为的宗教概念与古代的差异。考虑到罗马当时的风气,宗教信仰多元化,人们普遍具有宗教文化习俗,拥有宗教身份和团体归属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倒不如说没有宗教身份才是奇特的。^[10] 但是他不把自己归为信奉某一流派的哲学家,从职业上也好、组织归属上也好、写作目的上也好都不是当时所谓的“哲学”的。因为哲学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反而是奇特的身份。只不过哲学之名在当时的知识氛围中并非与宗教对立的,相反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学问的意思。“‘哲学’这一概念在罗马后期已成为‘幸福生活指南’的代名词”。^[11] 奥古斯丁在《论幸福生活》及《反学园派》中都曾认为真正的幸福在于哲学。^[12] 他把基督教看作是哲学中真正通往上帝的无碍道路。^[13] 在“爱智慧”的普遍意义上,基督教是真正的哲学。^[14] 所以他使用这一表述,把基督教认为是真哲学,但不是说基督教是“哲学流派”。

基督教对奥古斯丁产生吸引力的特殊性之一也于其历史事实。圣经的权威代替了希腊人、罗马人的神谕,对于奥古斯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传播广大的现实结果,甚至安布罗斯作为主教在罗马临时首都米兰具有的现实权威深深震撼了奥古斯丁。对于一个在摩尼教势力较大的非洲出身的小贵族子弟,奥古斯丁在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区看到的是基督教对其它宗教与哲学流派的胜利,我们可以想象他对于基督教在多元宗教版图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他在《忏悔录》记述在米兰经历的各种社会事件与朋友的交往,中流露出把这种现实作为其思想改变的基础。古代宗教并非如现代认为的是一种个人的选择,而更多是一种公共的、群体的生活方式。^[15] 正如罗马人曾经有把被征服的神纳

[9] 以上参见:Hippo. S A B O, Wills G. Saint Augustine's Conversion (Viking, 2004), 5-6.

[10] 例如现代学者对罗马帝国宗教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庞贝古城的考古挖掘的宗教生活研究,发现宗教在罗马人生活中的公共性。古代晚期的情况,基督教胜过罗马传统宗教但并不与其它宗教直接对立,参考 J. Northet al., Religions of Rome (Cambridge, U. 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64ff.

[11] 赵敦华 Zhao Dunhua, 基督教哲学 1500 年 Jidujiao Zhexue [Christian Philosophy 1500], 第 2 版 Second Edition. (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153.

[12] Augustine, the Happy Life in Writings of Saint Augustine volume 1, trans. Schopp, Ludwig (New York: Cima Publishing Co., 1948), 43 n. 1.

[13] Ibid., 45.

[14] 《驳朱利安》IV 14. 72. Augustine, Against Julian., trans. Matthew A. Schumacher, C. S. C., (New York: Fathers of the Church, inc., 1957), 228..

[15] 参考 J. Ru · pke, On Roman religion: Lived religion and the individual in ancient Rome. 2016, p. 1-2, 8-9.

入自己万神庙的传统,只有最终胜利的神才是真神,因为如果不是真神的喜悦,谁又能够获得胜利呢?虽然神意莫测,但终究神意落实到地上会有结果。圣经提供了解读神意的文本依据,奥古斯丁说,“由于我们的能力薄弱,不能单靠理智来寻获真理,便需要圣经的权力,从此我也开始开除如果你不是要人们通过圣经而相信你,寻获你,你绝不会使圣经在全世界享有如此崇高的权威……”他也承认,“基督教信仰传布于全世界,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权,绝不是偶然而毫无意义的。”(《忏悔录》6.5,6.11)

他相信圣经是来自于神的话语,但不是指字面意义,而是指圣经在不同的读者看来有不同的效果,对于一般读者是通晓明白的,但对于少数有能力研究的人则是隐微的真理入口。要有一般读者数量上的基础才能够产生更多获知真理的幸运儿。(同上 6.5)他并非轻易地尊奉圣经的字面意义,而是将其看背后有神圣启示的“谜面”,就好像希腊的“神谕”传统,普通人只能看到一堆毫无逻辑的词语,但是得到神灵感动的的神官就能解读出神的真意。而要成为神官,除了求得圣灵感动,还要学会特殊的阐释技巧,而这种训练就是哲学提供的。所以这种理解与他对学园派的怀疑论论证思路是一样的,即相信一种神秘而更根本的“神圣知识”。我们从中能够看出一种诺斯替思潮的影响,但这种隐微知识的传统又比之更为久远在希腊神秘宗教、甚至柏拉图主义那里就能看到。例如奥古斯丁就知道毕达哥拉斯的秘传传统。(《论秩序 2.53》)到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普罗提诺,据说他的老师教导真正的柏拉图主义但却要求学生不准外传。这种宗教与哲学衣钵的心传传统直到奥古斯丁时代仍然对于知识分子具有吸引力。

他把圣经接受为神的启示,把基督教真理看作文字启示背后的奥秘,再以哲学教导与自身的才智作为阐释的工具。对他来说,真理已经摆在那里,如果圣经有字面的矛盾或者自身理性认识出现怀疑,那么需要调整和改变的是自己的论证逻辑,直到一切都趋于和谐。^[16]例如他认为自己接受了柏拉图主义后能够理解过去认为有矛盾的保罗著作,“清楚看出这些纯粹的言论绝无歧异之处,我学会了‘战战兢兢地快乐’。”(《忏悔录》7.21)有了柏拉图主义的框架,圣经的“文字”开始显露出“精神”,反过来这种精神又统摄了他对文字的理解。可以说他掌握了打开寓意释经学大门的钥匙,或者说能够根据信仰的前提把圣经的“文字”建构成系统的神学。但无论如何却不是为柏拉图主义而论证。

如果说古代哲学家也普遍有神学(伊壁鸠鲁派等除外),例如新柏拉图主义的“太一”是哲学家抽象的神,那么当时古代晚期的哲学思想与宗教思想的区分又是什么呢?从奥古斯丁对学园派批判看,至少有两个标准:宗教有(完美、已然完成的)智慧者,宗教有启示的经典。但是各种哲学流派只有:(进行中的)智慧的追求者,纯粹依靠自身理性的训练。他认为自己阅读柏拉图主义著作是上帝让他通达真理安排的道路,“[我]能知道找寻目的而不识途径的人,与找寻通往幸福的天乡——不仅为参观而是为了定居下来——的道路,二者有何区别。”(《忏悔录》7.20)

在上述宗教与哲学区分的意义上看,奥古斯丁始终是宗教的立场,从来没有从“哲学”变成“宗教”的时候。有变化的只是不同的哲学思想促使他对神的理解有了新的变化。哲学只是过程、工具而不是目的。他的早期著作确实是他自己接受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证明,但这种接受是他对信仰的理解逻辑的改变,这种逻辑指向的结论是基督教——而这才是皈依的对象。更确切地说,并不是哲学的逻辑指向了信仰,而是信仰有了新的论证逻辑。

2. 柏拉图主义为基督教信仰扫除的障碍

奥古斯丁坦诚地宣告,“我是如此地时刻准备着,迫不及待地想要抓住真理,不仅依靠信仰而且依

[16] 例如安布罗斯的著作就很好体现了当时米兰圈子的论证逻辑,他经常为了论证目的而脱离文本语境地适用圣经例子,将其作为论证的事实案例与权威话语。

靠理解,我确定在那个时刻,我将会与柏拉图主义者一道找到它,它并不会与我们神圣的奥秘有任何区别。”(《反学园派》Ⅲ. 20. 43)他确实地区分了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的“奥秘”,而后者才是他真正想要获得的东西。早期奥古斯丁知道这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而这奥秘只向真诚地坚定信仰的人透露。(《论秩序》2. 16)

1. 在神的本性上。奥古斯丁从摩尼教时期开始就相信神的存在,对这个问题不需要哲学证明,他的转变在于如何理解“神”:神是什么?神如何作用于万物?等等。而柏拉图主义为他扫除的障碍是基督教中的“道成肉身”与“创世”等独特教义在理解上的困难。他在《忏悔录》描述自己活得这种觉悟的奇妙经历说,“我读了柏拉图派学者的著作后,懂得在物质世界外找寻真理,我从‘受造之物,辨识你形而上的神性’”。他感觉自己被上帝提升到了理智世界,发现自己看到的真理就是“存在本身”(esse),然后,他微弱的视觉被一道强光所震撼,内心激动近乎迷狂,然后他才发觉自己:“是远离了你漂流异地”(《忏悔录》7. 10. 16)神在这个物质世界之外,所以能够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而且神在理智世界中才能被认识,他就是“道”、“真理”本身。

2. 在真理不可知的难题上。学园派提出了认识真理的难题,因为其论的精妙,确实困扰了奥古斯丁:如果人在本质上无法认识真理,那么人怎么知道他信仰的(宗教)是真理呢。但奥古斯丁认为学园派的难题的答案其实指向了“真正的柏拉图主义”。因为学园派的怀疑论其实不是学园派的真正学说,而只是他们为斯多亚认识论提出的反对意见。大众对学园派的“怀疑论”印象来源于这里,所以武断地认为学园派就是倡导“一切不可知,真理也不可知”的学派。斯多亚认为真理可以通过感觉印象被“掌握”。^[17]这个怀疑论论证的重点在于感觉认识能力并不具备判断真与假的标准,也就是说感觉不是认识真理的能力。对感觉进行判断,需要借助不同于感官的、更高级的认识能力,并且要证明这种能力其实是能够知道真理的。那么,这就是理性的力量。跟进一步,理性最优秀的人,智慧者应该是能够知道真理的。(《反学园派》Ⅱ. 6. 15)

3. 真理的尺度问题。人的灵魂要知道自己获得的东西是否恰当,就需要一个尺度或者说标准(modum),没有标准就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是过了还是不及。没有标准也就不可能拥有真理。而学园派促使人们去寻找真理,却并没有找到真理的标准。因此,光有寻找是不够的,幸福生活就是获知真理标准的生活,就是拥有真理的(智慧的)生活。圣经上说,“我是真理”,因此幸福生活也就是拥有神的生活。(以上见《论幸福生活》2. 14, 4. 31,)

3. 对个体存在问题的辩护逻辑

奥古斯丁结合柏拉图主义提出的属于自己的信仰辩护方案在于对“爱-智慧”的颠覆性解释。他对学园派怀疑主义的反驳贯穿了整个加西齐亚根对话。他就学园派的论证提出一个悖论:如何确定谁是智慧者?智慧者在别人看来是智慧的吗?那么这位评判者又如何知道、以何为标准呢?(以上参考《反学园派》3. 4)即使世界上有智慧者,只要他是一个个体,他就无法判断自己获得的知识是否是智慧的,别人也无法判断他是否是智慧的。就因为这种“真理标准的问题”,在“爱-智慧”的道路就算是西塞罗也无法找出一个已经成功的智慧者,也无法知道自己处于这条爱的道路上什么位置。所以奥古斯丁在《反学园派》中就已经选定了一条宗教的道路:不是人去寻求智慧,而是智慧本身向人启示;不是人去寻找智慧/真理成为智慧者,而是智慧者决定了什么是智慧和真理。智慧者就是真理的认识者,就等于真理本身。因为柏拉图主义给奥古斯丁的启发就是到“精神世界”(或者用他们的术语应该

[17] 汪子嵩等 Wang Zisong et al.,《希腊哲学史》Xila zhhexueshi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第四卷 Fourth Vol. (北京 Beijing: 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第 488 页。

叫“理智世界”)去寻找真理,而理智世界就是思的世界,真理本身就是思想。希腊哲学的“努斯”概念被奥古斯丁进行了转化,真理就是真理的认识者。而这个理论上的空位被填入了一个确定的人,圣人理想落地生根有了一个实体,那就是基督教所信仰的基督。圣经中对基督的记载就是真理的启示,只不过不是字面意义,而是背后超越人类理性的智慧。

首先,奥古斯丁归纳了一个西塞罗等哲学家比较赞同的定义:“智慧是关于神圣事物和人类事物的知识”。(《反学园派》I. 4. 16)在两种事物中,更重要的,当然是“神圣事务”,也就是对神的认识。在这个定义之后,对话举出了一个类似于有神通的“巫师”阿尔比凯利的例子,用以反证一个人拥有两种知识却品德有缺,不能够被称为“智慧者”。例如,奥古斯丁说,“我宁可希望这位阿尔比凯利能够教导向他求学作诗的人,或者在咨询者的请求下,他能够马上就别人提出的某个主题自己作诗。”(《反学园派》I. 7. 19, 21)其它各种在当时为人们“求神问卜”的职业者都不能算作有智慧或真正的知识。

奥古斯丁重新区分了“智慧者”与“哲学家”,并指出后者是对智慧的寻求者,处于寻求智慧的过程中,并不表明已经拥有了智慧、到达了终点。对话里提出一个观点:幸福者应该是完美的。(《反学园派》1. 3. 7)因此而不是处于探索过程的“真理探索者”,而是真理的拥有者——“智慧者”。因此“智慧者”就是指拥有了真理的人,智慧就是指“拥有了真理(的完成状态)”。

其次,拥有真理的只有真理本身,真理即是神,因此只有神拥有真理。拥有智慧,就是认识真理,就是认识神,唯有神完全认识神本身。^[18]奥古斯丁说,“在我看来,智慧是,关于神圣和人类事物的、指向幸福生活的、不仅是知识,而且也是勤勉的探索。如果你想要分析叙述部分,那么它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拥有知识——是指向神的;而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完全满足于探索的——属于人。进而,神以第一部分而是幸福的,人以另一部分而是幸福的。”(《反学园派》I. 8. 23)结合前面对智慧的两重区分看,单纯人类之中理论上不可能有“智慧者”,如果有人是智慧者,那么他必须既是人又是神(完全的智慧、完全地认识和拥有真理、也就是真理本身)。

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最重要通往真理途径已经被打通,那就是倾听智慧者的启示。但最后的结果是有拣选的,需要“最纯洁的人”(《独语录》20. 34)等等限定。虽然真理不在感觉世界,但它存在于理智世界并可以为理性认识,奥古斯丁总结:真理是可以认识的。需要的是两种力量——理性和权威。这个权威对于当时的奥古斯丁来说,就是耶稣。他既然尚未获得真理,那么心灵为了保持对真理的追求就要借助权威的力量,这种心灵状态就是“信仰”。(《反学园派》3. 20. 43)对奥古斯丁而言,同时符合这些条件的就只有基督宗教中启示的“基督”。奥古斯丁说,“我现在恳求最高神的权柄和智慧,除了神秘的[圣经]向我们启示为神之子的那位之外还是谁呢?”(《反学园派》2. 1. 1)

总之,奥古斯丁的解决方案是指出,智慧者认识智慧,他知道自己认识真理,而不需要别人的判定——智慧者的存在本身就指示出了智慧的所在、真理的所在,他所知道的就是智慧,反过来也是如此,智慧就是智慧者所知道的。智慧者与智慧并不是二分的而是统一的。那么,智慧者,他的智慧会失去吗,例如睡眠或者疯狂?奥古斯丁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智慧者定义了什么是智慧,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就不是智慧。(参考《反学园派》3. 13. 29 及下,特别是 3. 14. 31)

遵从上述逻辑,奥古斯丁最后总结:真理是可以认识的。需要的是两种力量——理性和权威。这个权威对于当时的奥古斯丁来说,就是基督。他既然尚未获得真理,那么心灵为了保持对真理的追求就要借助权威的力量,这种心灵状态就是“信仰”。(《反学园派》3. 20. 43)所以,权威的作用乃是在探求真理过程中指明方向并坚定信仰的,因为权威就是真理本身。与哲学不同的是,权威的证据就在于“事实”,这个世界的秩序、世界之所以如此以及正是如此,正是真理作用的结果。古代的贤人并非真正的权威,而是这个世界中出现了这些贤人并参与到世界的伟大秩序中去,这个事实就是最大的权

[18] 见奥古斯丁的《论幸福生活》4. 34,参考稍晚的著作《论教师》11. 38. 48-49 等处。

威。人的理性的作用就是对此做出理解。(参考《论秩序》2. 17-28, 32)

4. 结论

在皈依之前和之后,他是这么看待基督的,“假使记载确实,则我在基督身上看到一个完整的人,不是仅有人的肉体,或仅有肉体灵魂而无理性,而是一个真正的人,但我以为基督的所以超越任何人,不是因为真理的化身,而是由于卓越的人格,更完美地和智慧结合。”(《忏悔录》7. 19)因此,仅从这点出发,在奥古斯丁认定基督就是真理化身时,他的自我认同就已经是基督徒了。基督如何是真理的化身,这一宗教表白(confession)的逻辑在最早的作品加西齐亚根对话中就已打通。在独语录的开篇祈祷,奥古斯丁已经认识到特殊的基督教教义,他眼中的神并不是一个哲学家的抽象的神,而是一个倾听人祷告的三一人格神。

他在后期著作更加显明了上帝对智慧的自由与主权:

我们不仅承认,而且特别要宣告,确实存在着的是上帝的最高智慧,每个灵魂——无论他声称有何等的真知灼见——其智慧都是从那里来的。至于我们称之为“世界”的有形质的万物,是否有灵魂可言,或者是否有自己的灵魂,即是否具有可借以掌管自身运动的理性生命,这是一个宽泛而晦涩的问题。……。既然没有灵魂能从其他灵魂一一而不是上帝最高而永恒的智慧那里获得智慧和祝福,即便这个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于人又有何妨呢?(《论四福音的和谐》I. 35)^[19]

奥古斯丁把非人格的努斯(理智本原、智慧本体)替换成了人格化的上帝,似乎是一种武断的嫁接。如果说真理,或者说努斯、理智世界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加上会变化的人格因素岂不是就矛盾了?奥古斯丁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正是他写作加西齐亚根对话的动力。在《反学园派》中,奥古斯丁以哲学思考为开端却以宗教信仰为结尾,联系整个“加西齐亚根对话集”的主题,可以说这是他内心皈依基督教之后写下的坦白思想的“忏悔录”。他把理由和原因悉数展开,让他的家人和朋友评判自己的信仰是否自愿以及理由充分。所以他通过哲学思索得出的权威和指引的“神”不是抽象的“神”,却是宗教的“基督”,因为他“发现没有比他更有权柄的”(《反学园派》3. 20, 43)。奥古斯丁说,“属于哲学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关于灵魂,第二个关于神。”(《论秩序》2. 47)而他坚定的答案,或者整个哲学发展的基础是“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真理不朽)(《独语录》18. 32)因此,他所说的哲学其实就是神学,与他对智慧的定义的二分是相对应的。但哲学的角色更多是一种对已然确立的东西的辩护,而不是说通过哲学自身就到达了他所信仰的东西(类似“自然神学”)。我们至少看到他感受到的宗教现实与自己的宗教体验在思想“转变”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19] 奥古斯丁 Augustine,《论四福音的和谐》Lun Sifuyin de hexi [The Harmony of the Gospels]. 萨蒙德英译 S. D. F. Salmond English tr., 许一新汉译 Xu Xinyi Chinese tr., (北京 Beijing: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Sanlian Shudian[SDX Joint Publishing, 2010]), 45-46. 奥古斯丁认为,人凭借上帝在人的灵魂中埋下的尺度才能发现自然界的和谐运动和规律,所以人对自然的认识能力也来自上帝。见 BAI Junxiao, “Reasonable Measurement and Motion: Numerical Order in the Soul and Mus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no. 15 (2018): 27-48.

English Title:

When did Philosophy Converts to Religion? Early Augustine's Confession before His Confessions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Ph. D. Student Supervisor, Assistant of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at Zhejiang University. His recent books include *Augustine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 of Mysticism: Plotinus's Archaeology of the One*. Address: Philosophy Department, Zijinggang Campu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310010, China. Email: chen Yuehua@zju.edu.cn.

Abstract: Early Augustine learned Platonic Philosophy in Milan, which played a key role in his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Apart from his recollections in *Confessions*, his first writings, *Cassiciacum Dialogues*, provide significant clues as to when and how his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turned into religious belief. Actually, his reasons for writing the manuscript were an effort to harmonize Christian doctrine and philosophy, the great influence of the Milan Church, and his mystical religious experience. In his writings, he dealt with the crisis of meaning in human existence: how could one know the Truth and live a happy life? Philosophy provided the framework for his probing, but only Christianity provided him with the answers: God is the Truth, wisdom is to know and have the Truth, and thus a wise man must be both God and man, who is the incarnation of Logos, Jesus Christ. Therefor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Augustine's writings were religious confessions, with philosophy serving only as rational tool to explain what is apprehended as truth and fact.

Key Words: Augustine; Patristics; *Cassiciacum Dialogues*